

跨越中缅边境上学的孩子们

薛茜文

今年儿童节前,教师岩胜收到班文小学的邀请函,希望他回校与学生过“六一”。尽管已经调至其他学校教书,但岩胜还记得,两年前的那个“六一”儿童节,他从县城骑着摩托车回校路上,特地买了三头洋葱和一盒口香糖——见识洋葱和吃口香糖曾是学生们的“六一”愿望。

班文小学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最边缘的班文村,村庄位于中国西南部的边境尽头,和缅甸仅仅隔着一条南卡江。村里有2000多人口,班文小学是村里唯一的小学,老师只有四位,岩胜曾是其中之一。近百名上课的学生中有十几名缅甸学生,他们每年都会和当地的孩子一起过儿童节。

由于是“跨国”学生,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,多少会遭遇些“尴尬”。

偷偷观望的缅甸学生

岩胜目前在乡里的公信中学教书,两年前从班文小学调走后,他仍和一些学生保持密切联系。他的宿舍就在乡中心小学,上班路上,能看到以前的学生正在打扫卫生。其中有个叫岩帅的男孩曾是岩胜的“得意门生”,总会让他多看两眼。其他孩子都会与他打招呼,而岩帅只是安静地站在一旁腼腆地笑。

2012年10月份,岩胜通过教师编制考试,分配到了班文小学。仅有的四名老师每人各负责一个班级,要兼职各科教学。作为唯一拥有本科学历的他,被安排当了最高年级——“四年级”的班主任兼各科老师,之所以是“最高”,是因为班文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。



中缅边境,放学路上的小学生们

岩帅是岩胜班里仅有的两名缅甸学生之一,故乡在缅甸邦康市第二特区,那里与中国相邻,生活方式相似,当地人喜欢中国的安定环境,许多缅甸人通过婚姻获得中国户口,或是通过亲戚的关系居住在中国,还有的直接“偷渡”,以“黑户”的形式生活在中国大陆。很多人的后代也在中国读书。岩帅随父母来到中国,已生活了5年多。“他非常听话,也很勤快,有时会来帮我烧火,接水。”岩胜告诉记者,岩帅当时成绩一直是班级前三,并且任副班长一职,他和父母借宿在另一名老师家中,经常帮助这位老师放牛、砍柴。

由于岩帅温和的性子,班里的女生经常逗他,他都是憨憨地,以微笑着回应。不同于岩帅的“合群”,另一位同样来自缅甸的孩子尼垮显得有些孤僻,但成绩一直在班排第一,并且担任班长。有次下大雨,尼垮和几个孩子一块迟到,岩胜盘问迟到的原因时,其他的学生都说是因为避雨来晚,而尼垮一声不吭,岩胜严厉批评时,也只是一直低着头不说

话。然而这位成绩优秀的“孤僻少年”在第二学期就退学了,他从舅舅家离开,回到了缅甸。

即使尼垮继续读下去,也会和现在的岩帅一样,六年级后就要遭到“强制终止”,他们没有户口和学籍,小学只能以借读的形式维持,而中学需要有学籍才行。

当地的学生大多都是佤族人,不会说普通话,当地的教学要使用“双语”,一边是普通话,一边是佤族话。来自缅甸的学生很小就已经跟随父母来到中国,佤族话早已成了他们的“故乡话”,而且他们的汉语也说得流利。

然而在当地的孩子眼中,即使说着同样语言,缅甸的孩子还是跟自己有些“不同”。“老师,他是从缅甸来的,他们家很远。”岩胜上任没几天,就有学生跟他打“小报告”。

缅甸的学生似乎也感觉得到自己和其他小朋友的不同。国家发的营养早餐,没有学籍的缅甸孩子领不到。“缅甸小朋友会躲在教室远远地偷看领营养餐的中国学生。不忍

心看到他们那种充满渴望的眼神。”岩胜说。

并不是每个缅甸孩子都能像岩帅那样有父母跟在身边。三年级的学生岩朋寄宿在舅舅家,父母在缅甸。宿舍的学生告诉岩胜,岩朋常常在晚上偷偷哭,他想念自己的家人,但是如果他不来中国读书的话,在他这个年纪就要去当童兵了。

岩胜在2013年10月调走后,吕华(化名)作为新老老师接了岩胜的班,也是四年级的班主任。比较当地学生,缅甸来的学生年纪偏大些,吕华的班上有个女生16岁了,比同班同学大5岁多。

他们的六一儿童节

在班文村,因为“村村通”工程,村里的电视能收到几个台,学生们看得最多的是央视一套,他们和外面的世界通过小屏幕产生联结,而这些画面也成为了他们童年的所有想象。他们知道动画里的人物,男生们会模仿《熊出没》里的光头强,还知道一些歌唱明星,比如汪峰。岩帅也喜欢明星,喜欢唱《我的老班长》,每次音乐课上,都会嚷着让岩胜播放这首歌,边听边唱。

缅甸佤邦很崇拜毛泽东,岩帅告诉岩胜,他的偶像是毛泽东和习近平,未来的梦想是当兵。学校每周会举行升旗仪式,学生们会跟着唱国歌。班文小学在一年级的的时候就教学生们唱国歌,包括缅甸孩子在内的学生都会唱。通常情况下用音响播放,所有学生行注目礼;如果没电,学生们就要唱起国歌。岩胜说,学生们的歌声总给人一种莫

名的感动。

当地学生平时的生活和大山、树林分不开,和农活也分不开。年纪很小的孩子就要帮助父母干农活,砍柴、放牛、喂猪。一些缅甸的学生,家庭经济水平一般,要经常帮助父母干活,很早就当起了“小大人”,很多缅甸学生连200元的借读费都交不起。父母只能以帮助当地人管理橡胶林或放牛等赚取微薄的收入,一棵树一个月下来只能挣到几毛钱,有时还要受到当地人的歧视。

学校的儿童节过得非常隆重,通常村领导甚至县领导都会来和老师、学生们一块过节,没有才艺展示,但一顿丰盛的午餐足以让孩子满心欢喜。岩胜向记者回忆,2013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那天,领导带着一万多元“巨款”来到小学,宰了一头猪庆祝,还发一些平时吃不到的糖果和零食,学生们下午不上课,自由地在操场游戏,每个孩子的嘴都咧得很大。

当地和缅甸虽然只隔着一条江,要进入缅甸的话,国人要到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花10块钱办理出入证,有效期半年,而居住在中国的缅甸人回去很方便,走一天的山路就能到,骑摩托车更快。很多缅甸人并不愿意回去,缅甸的学生也是放假或家里出事才回去,家人平时都居住在中国。

已经读六年级的岩帅,夏天过后就要跟学校永久“再见”了,他说非常羡慕可以继续读书的同学,但他的父母已经帮他找好“毕业”后的活计了。

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5年第20期

传奇大将陈赓

尹家民



了个纸条,让伙计递到后台,请黎莉莉到门口来。他刚想往门口走,旁边的座位上伸出一只手,在他手腕上点了两点,细声细气地说:“王先生,好久不见?”

陈赓的心猛地紧缩起来。虽是暗处,凭那个年纪轻轻,瘦骨嶙峋的模样,凭那一副假女人的嗓音,陈赓一下就认出绰号“小白脸”的叛徒就坐在身边。他本名叫陈连生,原是上海先施公司学徒工,后在武汉我军委特务工作处工作,转到上海又在我党中央特科工作。他就是那时认识陈赓的,大家都叫他“阿连”。

陈赓以为这是“巧遇”,说了声:“我不认识你!”便离座走出去。阿连紧跟着出来,又过来搭讪:“哎,你不是王庸吗,怎么不认识?”“我就是不认识你,你给我滚远点!”说着,陈赓拔腿跑开。但腿伤刚愈,跑不快。

阿连的一只胳膊搭在陈赓肩上,苍白的瘦长脸上现出笑容:“咱们谈谈……”他一步步逼近陈赓。陈赓知道就要发生那件不可避免的事。他往后一跳,挥手朝阿连的胸口就是一拳。阿连摔了一下,乘机一闪身,巧妙地躲过了陈赓的第二拳。接着阿连便猛地冲向陈赓扑去。两个人扭作一团,气喘吁吁,一拳又一拳地厮打起来。陈赓挣脱了叛徒铁钩一般的手,刚跑出两步,躺在地上的叛徒就吹起了哨子。四周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四五个巡捕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,站在了陈赓四周。他们握着手枪,杀气腾腾,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陈赓。

陈赓被捕了,关进老闸门捕房西牢。房间里很潮湿,积满了垃圾的地板,再加上青苔、脏水、烂木头发出一阵阵臭味。四壁挂满了鞭子、链条和各种刑具。陈赓刚刚挨过鞭打,瘫坐在地上。缠着红布包头的印度籍巡捕坐在门外,突然瞪大眼睛,大惊失色,惶惑地问:“怎么?你是陈赓?你不是王先生吗?我见过你!”陈赓抹了一把嘴角的血丝,惨然一笑:“王先生已经死了。我就是陈赓!如果你还认识我,你给我办点事。”“什么事?”巡捕有些紧张。陈赓很费力地摸出口袋里的几文钱,丢到巡捕脚下:“你给我买包烟。”“我记得你不抽烟……”巡捕说着,还是收了钱,从怀里掏出一包烟。“先生,你还是说了吧,就要给你上电刑了!”“无非是个死!”

2.做最坏的打算

霎时间,尽管还没确诊,已让我从云端重重地摔了下来,再怎么冷静自持,心头的震撼也难以言喻。我仿佛看见自己那美好的经历与前程,瞬时像碎纸片一样飘落……检验医师一言不发,更让我觉得大事不妙。我恐慌地付度着,计算机屏幕上的亮点是否正在告诉我:你肚子里长了数十颗“肿瘤”,现在你已是濒临死亡的癌症晚期病人!

想到自己可能的病情,想到死神竟这么近距离地逼来,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愤怒:我一生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,从来没做过亏心事,这种绝症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?我不接受这种判决!绝望中,一向乐观的我忍不住冒出一丝卑微的盼望,自我安慰道:或许那片子不是从自己肚子里照出来的,而是医生拿错了数据;明早一觉醒来,或许会发现:“原来是自己吓自己的一场噩梦!”

从病房高楼隔着玻璃窗向外望去,外面的世界依然忙碌,阳光灿烂,但我完全感觉不到一丝温暖,只觉得好冷!我在凄惶中走出医院,心情跌至谷底。脑海中闪过一个又一个念头,除了再找良医确诊,我忽然悲伤又理智地想到,如果我的生命所剩无多,现在该做好哪些准备?

第二天,我当机立断,决定做最坏的打算,为了先铃和孩子,无论如何我都得把遗嘱准备好。我从律师那里领回一叠表格。律师花了几个钟头仔细说明遗嘱的类别,以及填写表格的注意事项。我一向自诩条理分明、不怕填表,可是依照台湾地区继承制度的有关规定,立遗嘱所需要处理的表格,还真是烦人。

我把那些表格锁在抽屉里,几次拿出来看一看,又扔回去。心里闷闷的,像是憋着一团火,随时可能爆裂。

在死亡面前跟法律打交道,这真是极为吊诡的一件事!死亡何其伤感,法律又是何其冷酷、无情。我独坐桌前,把遗嘱需要的文件摊了一桌子,一边深陷在生命即将走到绝境的悲哀里,一边又得极度理智而冷静地仔细思索身后事该怎么安排。

一份正式的遗嘱,必须严谨、周密地做好全盘考虑。律师告诉我,我的遗嘱必须考虑如

下几个方面。第一,假如我死了,我的遗产要如何分配给妻子和两个女儿?第二,假如妻子和我同时死了,遗产如何分配?第三,假如我和妻子、一个女儿不幸同时死亡,财产如何分配?第四,假如太太与两个女儿和我幸同时死亡,又该如何分配?

天哪!想到这些可能,我不寒而栗!然而,人间世事之荒谬,就在于你明知道它是荒谬的,可是又非做不可。我拿起笔,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我的遗嘱。

依照规定,这一式四份的遗嘱,总共24页,还必须是本人手写才有法律效力。我自11岁离乡赴美,就很少有手书中文,即便后来在中国工作,中文用得多了,也都是用电脑键盘敲出来的。这回为了写遗嘱,我必须工工整整、一个字一个字地亲自抄写,每个地方的姓名、地址、电话、身份证号等等,更不能有一字修改、涂写,一处有错便要全部重来。

律师把一叠厚厚的文件交给我时,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:“李先生,你慢慢写,不着急!”

然而,只要一想到自己时日不多,心里就惊慌得不得了,让我还怎么慢慢写?我边写边抱怨:“这不是折磨人嘛!我现在还有体力慢慢写,要是已经病入膏肓,谁还有力气写这东西啊?”

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面对这种抄写工作的。一个健康的人写起来可能不那么辛苦,而我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勉力而为,还要按捺住时不时冒出来的烦躁、气闷:“我才50出头,人生就要结束了?”才写到第二份,就已重誊了几十次,真是痛苦不堪!想着先铃、孩子,勉为其难地整整费了一天半时间,终于完成了这个苦差事。

怀着惆怅不安的心情,我回到家,面对妻子家人亲切的询问,只是支吾其词,含糊以对。以后都过得不好,思绪不宁,睡眠质量也更糟了。

一星期后,终于到了复诊看报告、正式聆听宣判的时候。医生看了我的PET检查结果,甚至不敢直视我的眼睛,告诉我实情。他安慰我,PET检查结果未必百分之百准确,他也不是癌症专科医生,腹部照出来的二十几个亮点,不一定是恶性肿瘤,仍有可能是炎症。

向死而生

我修的死亡学分 李开复

